

爱国画家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吴继金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美术宣传活动是抗战文艺中最为活跃的一环,美术工作者是抗战中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广大爱国画家不仅创作了大批反对侵略、鼓动民众起来抗战的优秀美术作品,而且还通过举办画展的方式募集捐款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甚至投笔从戎,拿起武器投身于战斗,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抗日战争 美术宣传 画家

在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之中,无论是抗日根据地的革命美术工作者,还是国统区、沦陷区的广大爱国画家,都怀着极其强烈的民族仇恨,把美术当作斗争的工具和武器,毅然拿起画笔、刻刀,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们或者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奔赴前线英勇杀敌;或者举办爱国画展,募集捐款支援祖国抗战;或者创作抗战作品,抒发祖国之情,激励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或者在严峻的斗争环境中不屈不挠,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总之,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参加到抗战中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 拥护抗战,宣传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国共合作和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置

身于战争洪流之中的广大美术工作者,没有囿于艺术的象牙之塔,而是奔走呼号,宣传鼓动,愤怒地谴责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热情地歌颂抗战将士的英勇献身精神,大声呼吁全民总动员,一致起来抗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战美术宣传运动。

美术,是抗战文艺中最为活跃的一环。正如漫画家黄茅在《略论战时美术》一文中所说:“美术,作为文化战线上重要的一环的艺术宣传的先锋,在抗战中它应该是以突击的姿态出现去开展她特殊的功能。”“一个国家在和别个国家交战中对于美术这支军队是不可缺少的。”^① 爱国的、进步的美术工作者在严酷的抗战斗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绘画在今日”,“它的作用已成了增加抗战的政治意识的有力武器”,“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不仅是靠武力,也还需要政治的宣传;所以绘画给予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是和飞机大炮给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一样重要的!”^②

美术在抗战中不仅是武器,而且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徐德华在抗战初期发表《美术到民间去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战以前,大家对美术的存在和价值,常常起怀疑,美术究竟有什么作用?在这个动乱的时代,人群也无暇去欣赏或玩味这生活上不必要的东西,他可以取消吗?不,也不可能,因为美术它具有大的感人性,比文字,比诗歌,更能直接的传达感情和内容,文字诗歌虽是发表和鼓动情绪的工具,但民众不一定全体能识得文字,也不一定全体能懂诗歌,有具体形象的美术,每个无识的人,都能够了解

① 黄茅:《略论战时美术》,参见杨益群编著:《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下册),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② 李桦、廖冰兄、赖少奇、新波、阳太阳等24人:《中国绘画工作同志致苏联同志书》,载桂林《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创刊号,参见杨益群:《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的作用、意义及影响》,《广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他,能懂得或看得出它表达的意识,所以美术并不是无用,它的作为发表的工具和感人性效力的伟大这一点,在文盲较多的中国,是更需要和更可利用,我们应该重新估定它社会的政治的价值。”^①

正因为美术在抗战宣传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广大美术工作者也意识到了自己肩上的职责。上海漫画界首先组成了漫画界救亡协会,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奔赴各地进行抗战美术宣传。全国抗日漫画运动的中心刊物《救亡漫画》创刊号上即发表题为《漫画战》文章,指出:“自芦沟桥的抗战一起,中国的漫画作家就组织‘漫画界救亡协会’,以期统一战线,准备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②《抗战漫画》对全国美术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了更进一步的号召和鼓动。该刊第8期为“全美术界动员特辑”,叶浅予在《写在特刊前面》一文中指出:“我们希望全美术界携起手来,怀着最大的热情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培养我们新的美术生命,漫画界更愿站在最前,负起袭击敌人的任务。”^③黄茅在《略论战时美术》一文中也号召:“让一切的美术工作者都昂扬起来吧!为着危急了的祖国,为着全人类的正义,和平,真理,我们得用自己战斗的武器在统一战线之下写、写,用我们的血去写!我们要写出敌人的卑鄙,无耻,凶残……我们更要写出中国抗战到底,写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④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

① 徐德华:在抗战初期发表《美术到民间去的问题》,参见杨益群编著:《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下册),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

② 毕克官、黄远林:《中国漫画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③ 同上书,第162页。

④ 黄茅:《略论战时美术》,参见杨益群编著:《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下册),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的激励下,很多美术工作者纷纷“跑向热情洋溢的群众团体,跑向炮火纷飞的战场……也跑向落后的城市或古老的乡村”。他们奔赴前线、走上街头、下工厂、到农村,搞创作办展览,宣传抗战,连一向清高自赏、超越政治的国画家们也概莫能外。四川成都的一位老画家说:“国画家是讲究清高的,在混沌的世事面前,我们讲清高。至于大敌当前,我们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能清高自守吗?”^①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代的动力,把‘象牙之塔’里的艺术推迫到‘十字街头’,把‘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推迫到变为‘宣传工具’。”^②画家们走出画室,走上十字街头,用绘画来进行抗战宣传,在武汉、长沙、南昌,人们就称之为“十字街头”抗战美术。这种“十字街头”美术一跃成为广为流行的美术形式。林风眠、唐一禾、叶浅予、常书鸿、方干民、王式廓、黎冰鸿、周令钊、张乐平、王文秋、费彝复、杨祖述、孙葆昌、许九麟等都作过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画。其中有油画宣传画、水墨宣传画、漫画宣传画。“‘十字街头’美术——抗战宣传画,以独特的形式被广泛地高悬于中国的城市和乡镇的十字街头,极大地发挥了美术的宣传功能,弥补了美术展览的不足。”^③这些美术宣传作品引导人们与现实抗争,唤起民众的觉悟和增强民族意识。

画家们还到工厂、农村、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区,甚至是抗战的前线,去体验生活,宣传抗战救国。以沈逸千为首的“战地写生队”,成员多为上海美专的毕业生,参加者有黄肇昌、彭华士等。他们自1940年2月,从成都到西安,然后经榆林到延安,最后回到了重庆。他们在延安“鲁艺”举行了“战地写生画展”,朱德总司令等

① 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83页。

② 阮荣春、胡光华:《中华民国美术史》,四川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

③ 同上书,第260页。

人参观了展览,艾思奇写下了观后意见:“有真实的内容,适当的形式,就有成功的艺术作品。就中国的美术运动来说,任务就在于反映抗战中的现实斗争,创造美术上的民族形式,战地写生队诸先生大作,正表现着这样的方向。”^①

画家吴作人在田汉、徐悲鸿的支持下,和中央大学美术系部分师生组成了“战地写生团”,他任团长,克服了许多困难和障碍,到河南潢田战区实地写生,搜集了描写抗战、宣传抗战的素材。“战地写生团”的收获虽然有一定局限,但开辟了面向现实、赴战地描写抗战、宣传抗战的新风气。这种战地写生活活动很快就被政治形势的恶化所限制未能继续下去,但所创作的作品如《赴战前夕》、《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等给人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油画家冯法祀,先后随抗敌演剧四、五队,长期活跃在广西靖西等边疆地带和黔桂铁路沿线,思想、创作双获丰收,不仅制作几十幅大型壁(布)画宣传抗日,而且还在桂林举办了《黔桂路工程写生》画展,得到田汉等人的好评,赞其“画笔常随足迹遥,二十年情史写红瓢。南荒一例成前敌,喜见精诚结汉瑶”。他的《捉虱子》、《饿死的兵》等作品,被徐悲鸿称为是“以急行军作法描写前后方之动人场面……留下了一个战士的足迹……是战争中的珍贵收获。”^②

著名木刻家赖少其于1938年底创作了轰动一时的《抗战门神》。翌年春节,桂林西南行营政治部三组特印制一万份,群众争相张贴,也引起桂林美术界的高度重视。著名木刻家李桦、知名美术评论家黄茅等特为之撰文加以评论,盛赞此画为木刻界杰作,使

① 王伯敏:《中国美术通史》第7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② 《中国油画百年图史》,广西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西南各地城乡“换上一副抗战的新气象”，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

著名画家徐悲鸿“相信只有人民能够拯救祖国于危亡，而艺术该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他决意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人民，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作出贡献”。^①他在抗战期间创作的一些美术作品，都强烈地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所创作各种体裁、主题的绘画作品，从艺术性来说，不仅千姿百态，气韵生动，用笔遒劲，墨象晕彰，而且整个画面富于节奏、对比、动律，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性来说，“自况”、“托兴”的爱国主义情感，几乎在每幅画作中都非常强烈。徐悲鸿历尽千辛万苦创作了《田横五百士》和《奚我后》。“有人问徐悲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能有这样大的毅力画完这样大的创作？他回答：主要是田横高风亮节的精神激动着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怒了他，中国人的自尊心促使着他，艺术家的诚心鼓励着他，所以他才能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画完这样的大幅作品”。^②再如徐悲鸿在抗战最为艰苦的1940年所创作的《愚公移山》巨幅国画，就是以《愚公移山》的寓言来鼓励人民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并坚信一定能取得胜利。总之，徐悲鸿在抗战时期的创作是与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与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其不少作品寓意深刻，渗透着对民族灾难极端悲愤的心情，寄寓了对祖国和人民的希望，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著名国画大师张善子，当听到日本侵略军杀害30万南京民众的暴行后，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立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抨击日寇暴行。他除参加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组织的赈济难民工作外，主

① 刘汝醴：《艺术放谈》，江苏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② 卢开祥：《徐悲鸿先生谈艺录》，王震编：《徐悲鸿评集》，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386页。

要从事美术创作。这期间,他创作最多的题材是中国历史上的爱国英雄与爱国故事。他连续创作了《弦高犒师》、《苏武牧羊》、《精忠报国》、《文天祥正气歌图》、《文天祥像》、《正气歌》中12幅人物画像及四维八德人物画像。其创作目的与动机如他在《文天祥像》上的题词剖露的:“要效文山先生,发扬民族精神。”同时,他还在各处举行《正气歌人物巡回展览》,起着宣传与动员民众抗日救亡的作用。“八·一三”周年纪念时,张善子创作出巨型的诗画《中国,怒吼了》。画面上端为怒吼的雄狮,象征着觉悟与奋起的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画面的下端为摇摇欲坠的日本富士山象征着日本帝国主义;一头鬃须怒张、双目如炬的巨狮正踏在小小富士山头,把山压得土崩泥溃,狮口大开,似乎发生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声;画的下端还题了一首诗:“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谁说中华民族懦弱?请看那抗日烽火,照耀着整个地球!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我们已团结一致。万众奋起,步伐整齐,不收失地决不休!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八·一三浴血搏战,爱国健儿,奋勇直前,杀得敌人惊破胆!”主题鲜明,生动感人,表达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给观众以极大的震撼。

广大美术工作者开展的抗战美术宣传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爱国主义精神,热情地讴歌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抗战精神,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震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 募集钱财,支援抗战

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人出人”,人人参加抗战,个个为抗战出力。

广大爱国画家(主要是国画家)也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支持抗战,他们在国内外举办了大量的募捐画展,既宣传了抗战,又筹集了资金支援祖国抗战事业。

著名国画家张善子认为:“多卖出一幅画,就多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多一份支援国家抗战的力量。”^①他在欧美两年间,先后举办一百多次画展,共募得捐款100余万元,全部汇回祖国支持抗战,自己没有染指毫厘。不仅如此,他还到各大学及民众团体宣传中国抗战,个人所作宣传讲演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为当时欧美等国的“一碗饭援华”、“援华中国周”等活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在美国举办画展时,其为抗战奔走呼叫的爱国热情感动了美国人民,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夫人多次邀请他进入白宫。对此,《新华日报》、《大公报》及欧美的一些报刊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盛赞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崇高的民族气节。

建国后曾任全国美协主席的何香凝,为了支援抗战也多次举办义卖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何香凝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批评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分析了救国救民的道路。接着,何香凝主办的救济国难书画展览会在上海开幕,各地书画名家捐赠精心杰作700多件参加义卖。何香凝在展览会的《宣言》中,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说:“东北事起,瞬逾两月,日本帝国主义者袭吾辽吉,陷吾龙江,扰吾津沽,军舰遍于要区,浪人横行都市,此而不抗,何以图存。”^②此次义卖共收款2.2万元,除捐助马占山及各抗日团体救伤药费1300元外,余款创办国难妇女救护训练班和援助反日罢工工人。1932年2月,由于蒋介石拒不支付十

① 王东伟:《张善子和他的抗日宣传画》,《四川文物》1986年第2期。

②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19—1937),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九路军的抗战经费,致使其许多战士在严寒的冬天仍穿着单衣。为了筹集支援十九路军经费,何香凝又主办了义卖画展,著名画家云集,当场挥毫绘画,何香凝则在画上用笔“补松”或“补梅”,一时轰动了上海。^①

徐悲鸿在抗战时期曾到南洋等地开办画展,为中国的抗战事业进行募捐。吴作人在《徐悲鸿先生生平》一文中记载:“正在1938年,著名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邀请他去印度,十月里他携带了大批作品离开重庆,一路在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地筹赈展览会,南洋各地热爱祖国的侨胞,对徐先生筹赈画展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在1939年到1942年之间,徐先生将历次筹赈画展所得都全部捐献,总额将近十万美金。”^②

艺术大师刘海粟1940年在印度尼西亚举办“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义卖收入超过30万盾,全部捐给贵州省红十字会转赠给前方抗日将士。1941年2月,刘海粟的筹赈画展在新加坡总中华商会开幕,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主持了开幕式。刘海粟在一次讲演中大声疾呼:“吾人论人格,不以人为标准,以气节为标准。不论何人,凡背叛民族,不爱国家者,必须反对。气节乃中国人之传统精神!唯有气节,始能临大节而不可夺……有伟大之人格,然后有伟大之艺术。一个国家或民族,其人民如有不屈之人格与丰富之智慧,必能创造一切,必能强盛。”当时在新加坡编辑《星洲日报》“晨星”副刊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上发表《刘海粟大师星华双赈画展目录序》一文中说:“在此地值得提出来一说的,倒是艺术家当处到像目下这样的国族危机严重的关头,是不是应丢去

①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19—1937),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页。

② 吴作人:《徐悲鸿先生生平》,《中国美术》1979年第1期。

了本行的艺术,而去握手榴弹,执枪杆,直接和敌人死拼,才能说对得起祖国与同胞这问题。爱国两字的具体化,是否是要出于直接行动的一条路?……我们只要有决心,有技艺,则无论何人,在无论何地,做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这事情有一点效力发生,能间接地推动抗战,增强国家民族的元气与声誉,都可以说是已尽了他报国的义务……从这样的观点来着眼,则艺术大师刘海粟氏,此次南来,游荷属一年,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①

除了张善子、何香凝、徐悲鸿、刘海粟等画家外,当时在国内这类的画展更多。梁又铭为了捐献飞机而举办“航空艺术展览大会”,张大千、晏济元联合举办画展为抗日募捐,董寿平也举行过“抗战募捐画展”,……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同中国文艺社、中法比瑞同学会等社会团体于1940年在重庆共同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劳军美展,共展出美术作品1000余件,将卖画所得的9000余元捐赠前方将士。^②

甚至一些不太知名的普通画家也通过卖画所得来支援抗战和救济难民。例如中学教师周涤钦是江苏盐城人,日寇占领盐城后来到长沙。他在长沙向徐悲鸿谈及想卖画用以支援抗日和救助难民,徐悲鸿极为赞赏,并亲自为周写了卖画启事一则,刊登在《长沙日报》上:“周涤钦先生富才思,能著作,又精艺事,造诣极深。抗战之初,周先生方任职镇江,即以其作品展览出售,获巨资以献国家。今来长沙,见战区被难者颠连无告,慨然发宏愿,拟得万金为救济流亡之用。其画已精妙如此,而其仁人之心,与其高贵之艺,益为

① 丘峰:《刘海粟与郁达夫》,《联合时报》2000年12月1日。

②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抗战时重庆文化》,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

斯世珍棕也,不佞钦佩之余,谨为介绍。”^①

义卖和筹赈画展除了在海外和国内的一些大城市主办外,即使在小城镇,也不例外。如浙江台州的温岭 1941 年举行“台风书画展览”,除了成年的书画家出作品外,一些青年、中学生善画的,也参加作品展览。^②展览期间,以县长出面,作品尽数义卖,所得之款,作为抗战之用。全国各地如江西贵溪、湖南衡阳、广西柳州、云南凯里和安顺、四川乐山和涪陵等地,都有为抗战而出现类似的书画义卖活动。

三 投笔从戎,参加抗战

抗战是一场血与火的生死决战,作为一个爱国的艺术家,不仅要求其用艺术为抗战服务,而且还要求他们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投笔从戎,奔赴战火纷飞的前线,拿起刀枪,不畏牺牲地同敌战斗。胡考在《建立抗战漫画的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漫画家不仅是抗敌的宣传工作者,而一定要是为国家民族不顾一切牺牲的战士。”要“在正确的抗敌政治主张的领导下,作有助抗战的有效的政治传播”,“不要逃避救国,而能完成自身在抗战中的任务”。^③

抗战时期,很多美术工作者既是画家,同时也是革命家、对敌斗争的战士。他们的美术创作不是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与时代隔绝的象牙塔中完成的,而是直接投身于斗争,投身于群众活动的结晶。他们不仅以其创作的美术作品影响和鼓舞人,而且更以其革

① 王钦韶、宁静主编:《中国现代名人掌故》(上),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77 页。

② 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383 页。

③ 陈池瑜:《中国现代美术学史》,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1 页。

命的精神来教育和感染人。例如“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艺术家们深入敌后,一手拿木刻刀,一手拿枪,直接在抗战前线进行了3年多的艰苦的斗争。日本友人三下志朗曾赞扬说:“中国版画家在非常艰巨的恶劣环境下,以大无畏的气概,不向黑暗势力低头,用鲜血和献身精神谱写了中国新兴版画史。中国版画家,是艺术家中的强者,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人民之魂,也是中国民族之魂。陈列的史料中,有一份《敌后方木刻》的报刊,是中国版画家到敌后开展版画活动的出版物,使我特别肃然起敬。在世界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战争中,有哪一个国家的版画家到敌人后方去战斗?只有中国。”^①

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很多才华横溢的美术工作者,为了民族的解放战争而献出生命。在华中根据地的新四军中有:张芸石,原在上海做美术工作,后在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四团任政治处宣教股宣传干事,在1944年苏中前线对敌喊话时被敌人打死;张祖尧,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团员,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牺牲;费立必在皖中地区任宣教股长,于攻击裕溪口附近敌伪据点的战斗中牺牲;项荒途在1943年苏北反“扫荡”中,他和夫人在转移阵地时被敌发觉,被敌人用刺刀刺死。木刻家林夫在浙江组织七·七版画研究会,1938年离开丽水回平阳老家,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上饶集中营,1942年在浙赣战役时,国民党向北后撤,上饶集中营在转移途中发生赤石暴动,林夫不幸遇害。

在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八路军中有:陈九于1943年10月在阜平县反扫荡不幸牺牲;刘韵波在赴太岳途中,路遇日兵,展开搏斗,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做美术工作的赵在

^① 李允经:《中国现代版画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青,在1942年反扫荡战斗中因被日本侵略军包围,跳崖献身;晋察冀边区“美协”委员钟蛟蟠、唐炎、焰羽等人,都为革命的艺术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东北沦陷区抗日文艺的先驱者、共产党员金剑啸,曾在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习美术,并积极参加上海的学生运动。1931年,他受共产党的委派,回到东北的哈尔滨。九一八事变后,他负责共产党所领导的哈尔滨文艺界的“反日会”工作。他为中共满洲省委出刊的《满洲红旗》(后改名为《东北红旗》、《东北人民革命报》)画报头、作插画,并主编《大北新报画刊》,团结进步文艺青年,把画刊办成了向敌人进行斗争的阵地。他对抗战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在《大北新报画刊》上预言:“只要播了种……不遇天灾。总是有果子可收的。”^①他以漫画和文学的形式,嘲笑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围剿的失败,还通过嘲讽墨索里尼发动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影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因在《大北新报画刊》报道红军长征和东北抗联袭击吉余的消息,同时用醒目的标题登载了高尔基病重的消息和头像,因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于1936年8月15日英勇就义,年仅27岁。

四 横眉冷对,不畏强暴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广大爱国画家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气节,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等民族败类横眉冷对,拒不合作;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和人格的尊严,不为名利所动;对侵略者和卖国贼冷嘲热讽,作画嘲弄之;甚至冒着生命危险,

^① 冯为群、李春燕:《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

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

七七事变后,日本人想利用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名声,请他出任伪职。张大千听说后一阵大笑,并针锋相对地对登门求见的汉奸说:“我张大千是中国人,绝不给日本人干事!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那个汉奸见张大千态度如此坚决,只好灰溜溜地滚蛋了。最后,在北平任伪职的一位四川老乡“登门拜访”,用“关心”的口吻劝张大千归顺日本人。张大千深知这只日本狗的“良苦用心”,借口上海的一大批古画丢失,需立即去上海查明,谢绝了他的“好意”。^①张大千后来想方设法脱离了敌伪的控制,辗转地从北平回到了四川。北平沦陷后,李苦禅辞去一切职务,过着以卖画为生的隐居生活。当时日伪组织为了拉拢社会名流为他们装点门面,想举办“戡乱画展”,曾多次派人来请李苦禅出山,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名流也走马灯似地劝他参加。李苦禅愤然说:“国土沦丧,百姓涂炭,我岂能助纣为虐,替日伪干事!”^②汪精卫发表背叛祖国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和平宣言》后,派褚民谊到上海孤岛找到刘海粟。褚民谊说:“汪先生非常敬重你的才华和声望,想请你在他的政府里管管教育。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汪先生的器重!”刘海粟坚决地回答:“我是艺术家,画画才是我的天职,当官,我不适合。如今想当官的人很多,请汪先生另请高明,恕海粟不识抬举!”随后去南洋举办为抗战募捐的画展了。^③当时周作人等许多无耻文人,对于日本侵略者高官厚禄的利诱,纷纷粉墨登场,出任伪职,甘

① 周永祥主编:《五四以来——文化名人与祖国》,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② 王钦韶、宁静主编:《中国现代名人掌故》(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4—575页。

③ 石楠:《刘海粟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

当汉奸。张大千、刘海粟等人不为名利所动,拒绝出任伪职,表现了一个艺术家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人格。

北京沦陷后,齐白石毅然辞去受敌伪控制的北平艺专的教授职务。面对一些敌伪大小头目,时常上门找他索要字画,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画家,齐白石在大门上贴了“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白石老人心病发作,停止见客”等字条。有人为他担心,更有人劝他明哲保身,不要触犯敌伪政权的人。但齐白石无所畏惧,他宁可挨饿受冻,也决不去取媚于那些禽兽不如的强盗。他在诗中写道:“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显露出他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①溥儒,是清朝皇室后裔,以诗、书、画闻世,其画与张大千齐名,故有“南张北溥”之称。北平沦陷时期,很多日本人仰慕溥儒的作品,曾出高价请他作画,都遭到了拒绝。“满洲国”成立三周年时,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打算找溥儒、齐白石、陈半丁、俞陛云四人分画一幅春夏秋冬的堂屏,送给溥仪。王揖唐和清朝遗老金梁奉日本人之命,带着贵重礼金来北平西山,求溥儒画第一幅堂屏。溥儒坚辞不允。之后,齐白石等三人也相继拒绝了。当时,不少亲朋好友为之担心,而溥儒竟不以为意。终因他是影响较大的人物,又是溥仪的近支堂兄,才免于麻烦。溥儒隐居北京西山,过的是一种“安贫乐道”的生活。他能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保持民族气节,没有象溥伟、溥修等人那样投靠日本人,实属难能可贵。^②

总之,广大美术工作者在抗战中的爱国美术活动,为中国抗战

① 周永祥主编:《五四以来——文化名人与祖国》,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② 王振中:《记溥儒先生》,《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文化教育编》(第15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228页。

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不仅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而且在中国抗战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作者吴继金,湖北美术学院马列课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

2005年7月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的《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6万字。该书概要揭露记述了抗战胜利后受到审判,并被靖国神社后来供奉的在侵略亚洲与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14名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永野修身、平沼骐一郎、梅津美治郎、白鸟敏夫、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广田弘毅、东乡茂德、松冈洋右、小矶国昭的个人历史。